

欧阳修转益多师及其诗风渊源

吴大顺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不仅全面师法唐代诗歌技巧, 合理借鉴时辈诗人优点, 还大胆吸收散文、辞赋等文体质素, 形成了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诗歌风格。其不同文体师法各有侧重, 使其诗歌在不同的文体间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关键词: 欧阳修; 唐诗; 宋诗; 诗歌风格

中图分类号: I106/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1-0131-05

大凡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往往都是博采众长而转益多师的。若从文学创作的学缘看, 欧阳修应是十分丰富的, 他不但主动师法众多唐代诗人的创作技巧、合理借鉴同时代诗人的诗歌优点, 还大胆地吸收散文、辞赋等其他文体的成分, 从而成就了其诗歌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艺术风格。

一、对唐诗的全面师法

欧阳修对唐诗的学习是很全面的。他先后师法过韩愈、韦应物、李白、孟郊、贾岛、李贺、郑谷等诗人。其诗集中以师法唐人为题的就有《弹琴效贾岛体》《太白戏圣俞》(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刑部看竹效孟郊体》《栾城遇风效韩孟联句体》《春寒效李长吉体》等诗歌。

他曾在《六一诗话》中论及唐末郑谷诗时说:“其诗极有意思, 亦多佳句, 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 人家多以教小儿, 余为儿时, 犹诵之。”^{[1](1036)}宋人朱弁说:“圣俞少时, 专学韦苏州诗, 世人咀嚼不入, 唯欧公独爱玩之。”^{[2](21)}元人刘埙也认为欧诗“有甚似韦苏州者”。^{[3](70)}

当然, 在对唐代诸诗人学习中, 欧阳修用力最深的是韩愈和李白二人, 所以在对欧诗语言特点的认识上就有似韩说与似李说的分歧。近代学者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则比较细致地指出了欧诗的多重师门, 多样特色。

钱基博认为欧诗有“清炼似梅尧臣而原出郊岛之寒瘦”者; 有“俊逸似苏舜钦, 而原出李杜之豪放”者; 有“为李白之振奇, 而同韩愈之俶诡”者; 有“同白居易之乐易旷真”者。“以其才大而功深, 无所不学, 无所不似。大抵以中晚唐之清炼, 祛盛唐之浮廓; 而以盛唐中唐之豪荡, 舒晚唐之危仄。”^{[4](516--520)}

钱钟书也说:“欧公古诗不尽学昌黎, 亦显仿太白; 五律往往似梅宛陵; 夷陵咏风物排律又逼香山。”^{[5](214)}

(一) 关于学韩

欧阳修诗歌学习韩愈已成公论, 此不赘述。要强调的是欧阳修学韩的重点是学习韩诗“无施不可”的笔力。其在诗歌创作中尝试的各种技巧诸如化韵为散、化齐为杂、律古互渗等语言形式技巧和叙议结合、情理共融、曲折委备的行文方式等均是达到了其“叙人情、状物态”的“无施不可”和“变态百出”的表达效果所作的尝试。

对于笔力的强调, 《欧阳修全集》凡三处: 一是明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评梅尧臣诗时说:“其体长于本人情, 状风物, 英华雅正, 变态百出。”^{[1](532)}二是他晚年在《六一诗话》中评价韩愈诗歌时说:“退之笔力, 无施不可, 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 故其诗曰: ‘多情怀酒伴, 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 助谐谑, 叙人情, 状物态, 一寓于诗, 而曲尽其妙。”^{[1](1040-1041)}三是在《六一诗话》中评价杨亿等西昆体诗人时说:“盖其雄文博学, 笔力有余, 故无施而不可, 非如前世号诗人者, 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1](1039)}其中的“无施不

收稿日期: 2008-05-19; 修回日期: 2008-07-05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 《唐宋文人唱和与唱和诗研究》(05B058)

作者简介: 吴大顺(1968-), 男, 苗族, 湖南保靖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湖南省怀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音乐文学与诗词

可”当有两方面意思：一是指诗歌题材广泛，什么内容皆可入诗；二是指诗歌的语言表现功能强，什么内容都能充分表达。“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则是指韩愈等人诗歌长于记叙、精于说理的特色，是对“无施不可”笔力的具体描述。可见，欧阳修一生中选择韩愈诗歌作为师法对象，最重要的是因为韩愈诗歌表现出了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即所谓笔力。诗人对这种“无施不可”笔力的不懈追求，从而导引其诗歌往往注重叙事性和说理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已经同唐诗所追求的含蓄审美趣味有所差别了。正如朱熹所说：“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及至欧公，早渐渐要说出来。”^{[6](3334)}杨亿与欧阳修诗风的差异，其实质是唐诗审美观念与宋诗审美观念的差异。从这个意义说，欧阳修诗歌的“说出来”表明诗人对诗歌记叙、议论功能的追求中已经透露出几分思致之美。这也是欧阳修诗歌风格虽然呈现出平易疏畅却仍不乏“气格”的深层原因。^[7]

(二) 关于学李

欧阳修对李白的诗是很喜欢的。张戒《岁寒堂诗话》指出：“欧阳公学退之，又学李太白。”^{[8](452)}他对李白诗歌豪迈奔放的风格总是誉于言表。如其《太白戏圣俞》写道：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蔽视蜀道犹平川。官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婆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莹飞露湿吟秋草。^{[1](37)}

《笔说·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云：

落日欲没岷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大家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所到也。^{[1](1044)}

诚如胡仔所说：“嘉祐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9](58)}欧阳修对于李白的喜爱乃在于其平易洒脱的风格，他努力对这种风格加以吸收并融化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他的五七言古诗在表现题材与章法结构上继承了韩诗的某些特点，但就风格而言却没有韩诗的奇险。如庆历年元的《忆山示圣俞》就是一篇结构跌宕，行文曲折迂回，而语言疏畅的长诗。这似乎可以看做是诗人以李白诗

歌的平易风格对韩诗的矫正，而这显然也与他对于李白诗歌的喜爱、学习、继承有关。最为诗人称道的是其《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博采众长而自成一体的创作方法。该诗在构思立意上学习韩愈，诗写庐山高耸于长江之滨，以飞动的气势描写庐山千岩万壑、晨钟暮鼓之趣，从而表现对同年刘中允归隐其间的羡慕之情。在结构上全诗以散文章法为主，生新拗折。在韵律上该诗追步韩愈《病中赠张十八》，使用江韵。江韵属险韵，困难见巧，愈险愈奇。而在语言上又直接取法李白《庐山谣》《蜀道难》，句式参差，语言疏畅，气韵流走，有一气呵成之感。诚如钱钟书《宋诗选注》所云：“他(欧阳修)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10](27)}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上对韩、李均有所继承，对韩愈的继承表现在题材和诗歌的章法结构上，对李白的继承则更多地表现在诗歌语言风格上。可以说，他融化二人风格于一体而自出胸臆，形成了其诗歌既曲折多姿又情深韵远的平易疏畅诗风。如宋人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后集》所称赏的那样，欧阳修文学创作是“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9](168)}的。

二、对宋诗的合理吸收

欧阳修对其所生活的宋代诗坛也多有师法和借鉴。比较突出的有王禹偁、杨亿、钱维演、谢绛、梅尧臣等人。

欧阳修非常仰慕王禹偁的为人，在贬官滁州时瞻仰王禹偁的画像，并作《书王元之画像侧》云：

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1](78)}

因为王禹偁也曾经被贬到滁州做地方官，诗歌颌联化用王禹偁《滁州谢上表》“诸县丰登，若无公事。一家饱暖，共荷君恩”之语。诗的首句说自己踏着“前贤”足迹，到滁州来任职，表达了对王禹偁敬佩之情和效法之意。可以说，王禹偁对欧阳修的影响是很深的，欧阳修早期的政治态度、人生追求、文道观念、创作风格均有受王禹偁影响的痕迹。

王禹偁曾写过一篇《朋党论》说：

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

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尧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两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恶，虑其乱教，故两辨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君天下者能践斯言而行之，则朋党辨矣，又何难于破贼哉？^{[11](卷第十五)}

欧阳修著名的《朋党论》是否受到王禹偁此文启发呢？我们将二文作些对比。欧文曰：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1](124-125)}

王文将历史上各种朋党分成“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两类，然后从君子与小人的的人格特征与人君心理特征分析了“君子常不胜小人”的事实，最后希望人君能以《尚书》之言明辨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欧文重点在于阐明“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观点。二文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但从两文的对比中可见，欧阳修关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分显然受到王文启发。

关于文道关系，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不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言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矣……姑能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11](卷第十八)}

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说：“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1](481)}

二文都强调文章是用以明道的工具性质，“以使道能传之后人，取信于后世”才是目的。因此，所明之道要容易理解，那么文章的语言则要明了易懂。王文的

基本思想在于强调文的“传道明心”目的，而且古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要求“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欧文提出“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的主张当与王文“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主张有内在联系。

王禹偁诗歌创作虽然是从学习白居易开始的，但是他并未囿于元和一体，而是学习白居易乐府诗精神，写了一些现实性很强的讽谕诗。如《感流亡》《对雪》《射弩》等诗皆是“多涉规讽”“未尝空言”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且逐渐由学白向学杜转变，寻求诗歌的新境界，他自己曾作诗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12](405)}欧阳修以现实生活题材进行诗歌创作的努力，实在是对王禹偁诗歌现实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吴之振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13](《小畜集序》，13)}实为的论。

欧阳修于天圣八年充西京留守推官。当时，在洛阳聚集了一批声气相投的文人，经常在闲暇之时出游观景，诗酒高会，互相唱和，切磋诗艺。

王辟之《澠水燕谈录》云：

公(欧阳修)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字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磋，率尝赋诗饮酒，闲以谈戏，相得尤乐。^{[14](40)}

欧阳修《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也说：

文信公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间，余得日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1](174)}

洛阳最高官员钱惟演对这些天下文士十分优待，并时时参与其酒宴诗会。这是欧阳修诗文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也是他诗歌创作多方学习他人的重要时期，所以，他一方面受杨亿、钱惟演等西昆体诗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其诗友谢降、梅尧臣诗歌的影响。

欧阳修晚年在《归田录》中称杨亿为“真一代之文豪”^{[1](1023)}，并在《六一诗话》中对杨刘西昆体予以客观评价：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杨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1](1039)}

欧阳修对杨亿诸公的佳句大加赞赏，且将之与九僧相比，认为他们并不像九僧那样“区区于风云草木之

类,为许洞所困”。

刘克庄《后村诗话》载:

(蔡)君谟以诗寄欧公,公答云:“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世谓公尤恶杨、刘之作,而其言如此,岂公特恶其碑板奏疏磔裂故为偶俦者,而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欤!^{[15](22)}

翁方纲说西昆体:

宋元宪、景文、王君玉并游晏元献之门,其诗格皆不免杨、刘之遗。……此在东都,虽非极盛之选,然实亦为欧苏基地。^{[16](1402)}

明人张綖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还说:

杨、刘诸公唱和《西昆集》,盖学义山而过者,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17](340)}

由此不难看出,欧阳修对西昆体诗风有合理吸收的一面。

谢绛是当时诗坛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天圣明道年间曾任河南府通判。他“以文学知名一时”^{[18](9847)},曾被杨亿誉为“文中虎”,据说他“学博而辞多,用事至千余言不尽”^{[19](121)},诗风与后期西昆体诗人很接近。他是欧梅在西京幕府里最重要的诗友之一,对欧梅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欧阳修《试笔·谢希深论诗》曰:

往在洛时,尝见谢希深诵“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又见晏丞相常爱“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1](1050)}

《六一诗话》载梅尧臣论诗之言曰: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1](1037)}

这与上引欧阳修《试笔》中谢绛之论如出一辙。可见,梅尧臣“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观点与谢绛“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欧阳修洛阳之作《题张应之县斋》却有“县古仍无柳,池清尚有蛙”之句。这决非巧合,当是谢绛、梅尧臣还有欧阳修等人在诗歌唱和、诗艺切磋中所得出的共同体。

至于欧阳修早期对梅尧臣诗歌的学习借鉴,则经常在其诗文中给予说明。明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亦云:“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

也。”^{[1](532)}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云:“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1](35)}

三、对其他文体的借鉴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合理借鉴古文、辞赋的章法和语言,尤其是他自己成功的散文语言和结构特点,对其诗歌风格的形成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欧阳修从洛阳时期便开始潜心学习、研究韩愈的古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说:“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1](536)}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记载了一则轶闻:

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喜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20](140)}

欧阳修散文创作主要学习韩愈散文的章法结构。在语言上,他强调文以传道,而道非抽象的说理,乃是治国修身之法。他说:“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1](319)}“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所以,散文语言只要容易阐明道理就可以了。他抛弃了韩文言必己出的求奇求怪的一面,而继承了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故而形成了自己散文曲折往复、语言畅达的风格。如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所言:“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间(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21](328-329)}

欧阳修的散文风格迎合了宋代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学发展的要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范仲淹于庆历八年《尹师鲁河南集序》所说:“懿、僖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开)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修)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22]可见,在庆历年间,欧阳修就已经获得很高的文名。

随着欧阳修散文创作的成功和文坛地位的建立，在其诗歌创作中也有意无意地引入其散文中的行文方式、章法结构和语言特点，从而形成其诗歌平易疏畅的风格。

人们在讨论欧阳修“以文为诗”的时候，往往从师法韩愈的角度入手，殊不知，欧阳修自己的散文风格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也很明显，甚至更为直接。其散文“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的特点与其诗歌“平易疏畅”的风格显然有相通之处，这是欧阳修一贯的行文特点和语言风格在不同文体中的体现。可以说，欧阳修的散文成就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其诗歌。倒是吴之振先生看到了欧阳修散文与诗歌之间的渊源关系，他说：“其(欧阳修)诗如昌黎，以气格为主。昌黎时出排纂之句，文忠一归之于敷衍，略与其文相似也。”^[13](《欧阳文忠诗钞》315)

当然，其诗歌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是有所侧重的。这种侧重在文体上得到较明显的体现。对此，元人方回有具体评说：“读欧公诗，当以三法观。五言律初学晚唐，与梅圣俞相出入，其后乃自为散诞。七言律力变‘昆体’，不肯一毫涉组织，自成一家，高于刘白多矣。如五、七言古体则多近昌黎、太白，或有全类昌黎者，其人亦宋之昌黎也。”^[23](198)方回的评价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看到了欧阳修诗歌学习前人是分文体的，欧阳修分别从不同的前人那里学习不同文体的诗歌创作技巧。这也导致了他在不同的文体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6.
- [2] 朱弁. 风月堂诗话[C]//四库全书本.
- [3] 刘埙. 隐居通议[C]//丛书集成初编本.
- [4] 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5]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6] 朱熹著,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7] 崔际银. 始于笃学终于变新——略论欧阳修对韩愈的继承与发展[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1996, (4): .
- [8]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 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10] 钱钟书. 宋诗选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 [11] 王禹偁. 小畜集[C]//四部丛刊本.
- [12] 郭绍虞. 宋诗话辑佚·蔡宽夫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3] 吴之振. 宋诗钞[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4] 王辟之. 澠水燕谈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5] 刘克庄. 后村诗话·前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6] 翁方纲. 石洲诗话[M]. 清诗话续编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7] 王仲荦. 西昆酬唱集注·附录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8] 脱脱. 宋史·谢绛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9] 朱弁. 曲洧旧闻[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20] 邵博. 邵氏闻见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1] 苏洵. 嘉祐集笺注[M]. 曾枣庄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22] 范仲淹. 范文正公全集[C]//四部丛刊本.
- [23] 方回. 瀛奎律髓[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On Ou Yangxiu's poems' origin

WU Dash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Ou Yangxiu benefited from different teachers and some other scholars in his poem-inditing. He not only imitated the all-round skills from Tang Dynasty poems, borrowing those advantages from other poets at his time, and also adapted good points from essays and ode intrepidly, which formed his poem style with the noble and humble. He got different styles and characters in different styles in his poems because of his different imitation.

Key Words: Ou Yangxiu; Tang Dynasty poems; Song Dynasty Poems; poem style

[编辑：苏慧]